

朋友

——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

她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,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。

县委有两辆吉普车,他很少乘坐,他总是骑着自行车,穿梭于滹沱河两岸。从河北到河南,是一片大沙滩,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。

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:“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,他一个人来调研,骑一辆旧自行车,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。我问,‘习总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,你认得路啊?’习总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,说,‘打听,我打听着就来了!’”

这一年,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。

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,却又有苦难言的“高产穷县”。多年来,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,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。由于征购任务过重,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,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。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,无比痛心。可要摘掉“高产县”的帽子,无疑是自曝其丑,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,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“犯错误”。

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,还是主动向上呼吁?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,不愿让他出面,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。可习近平说:“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,你们不用担心。”于是,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,多次跑省进京,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。

1982年初夏,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。这一年秋季,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。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,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他分派的领域,更是事必躬亲,脚踏实地。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,花开花落,几多春秋,大家熟视无睹。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,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,众口无语。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,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,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。于是,围上铁栏,写明文字,加以保护。

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,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,他指示修缮保护。“岸下惨案”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。近平请人挖掘整理,开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……

1982年12月23日,近平打去电话,约大山见面。“好啊。但是,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,在我家吃晚饭吧。”大山说。交往就要一年了,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,作为地主,大山总是自责呢。邀请过几次,他总是笑笑说,君子之交淡如水,我们每次都喝茶水,已经够奢侈了,何必要喝酒水。今天,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。

近平怔了一下,居然答应了。那天晚上,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:雪里蕻炒肉、莲藕片、花生米和凉拌菜心。主食呢,就是涮羊肉。没有专用火锅,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,权当涮器。虽然器具简陋,但材料却不含糊:麻酱、韭花、蒜末、香菜、酱油一应俱全。

近平如约而至,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。炭火红红,蒸气腾腾,几杯小酒下肚,话题也热烈起来,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、文化局下属剧团、新华书店、文化馆、文保所等7家单位,三四百人,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,情况复杂,矛盾重重。最主要的是,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,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,却长久失修,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:“大山,如果让我当局长,能收拾这个摊子吗?”大山从小跟这个圈子打交道,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,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,于是,借着酒兴,脱口而出:“当然可以,只要给我权力,让我说话算数。”接着,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“施政纲领”。

这时,近平果断地说:“好,就让你当局长!”

大山惊呆了。原来,针对文化局的乱象,作为县委分管领导,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,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,无论对内还是对外,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导人物。考虑多日,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,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。大山成熟稳健,刚直正派,不仅善写小说,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,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。但大山不是党员,无意仕途。不过,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,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。于是,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多次沟通,在常委会上,他提议让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,并获得了通过。那天晚上,他就是前来通报的。

近平说:“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,还要有良好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,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、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。”大山难以置信:“可是,我不是党员啊。那个年代,党外老人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,而且也是部门正职,心如火烈火燃烧,眼似灯盏明亮。”

近平说:“不用担心,组织已经有了安排。”原来,县委常委已经形成决议:文化局局长主持全面工作。第二天上午,非党人士贾大山,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,连升三级,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。正定历史上,这是绝无仅有的!

习近平在《忆大山》一文中,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:“上任伊始,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,几个月下来,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,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古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,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,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,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”

士为知己者死。大山是一个文化人,却又是一个血性汉子。

在这里,且讲述几个细节。常山影剧院,被称为正定的“人民大会堂”,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,但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木结构建筑,已成危房。近平提议重新建造,为了保

证质量,为了保证工期,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到工地,日夜监工,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。

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,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。但由于年代久远,破破烂烂。若要全面修复,需要资金3000万。如此巨大的投资,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。为此,那两频频受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前来考察评估,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、省城和县城之间,往返数十趟,直累得心力交瘁,胃肠溃疡。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,牙关紧咬,冷汗直流。由于长期出差在外,药罐只得带在身边,白天跑工作,晚上熬中药,最后,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,落实巨资。

这项浩大的工程,还需要征地60亩,拆迁60户。其中困难,可想而知。经过千难万难,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。至此,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靓亮的文化名片!春节期间,是别人最欢乐、最放松的时候,却正是他最紧张、最揪心的时刻。九处国保单位,全是砖木结构建筑,最易着火。每逢此时,他昼夜巡视,废寝忘食。别人劝他,他说:“祖宗的遗产,国家的宝物,我负责守护。”出一点问题,我就对不起正定,对不起县委,对不起习总书记啊!”……

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。

历史已经证明,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按照自己的理想,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。虽然极其苦累,但也极其快活,极其酣畅。有人说,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、最幸福的人!

……这期间,近平升任县委书记,工作更忙了。但他仍然心中偷闲,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,夜聊。春雨润青,夏日泼墨,秋草摇黄,冬雪飞白。岁月如梭,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……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,大山已经休息。突然有人敲门,近平请他去一趟。原来,近平要调走了,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。白天交待工作,直忙到半夜,送走所有同事,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。好在,这个时间,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。

关于这一次离别,大山后来从未提起。倒是在近平的笔下,有一段清楚的记载:“……那个晚上,我们相约相聚,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。临分手时,两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依依惜别,难以言状。”

两人分手时,正好又是凌晨三点。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,四目相对,心底万千话语,口中竟无一言。与往常不同的是,这一次,县委大门敞开着。

采访时,大山妻子告诉我,那天晚上,大山回来时,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——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。他一言不发,倒头便睡,直到第二天中午。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。

妻子以为他病了,催他吃药。他摇摇头,慢慢地说一句:“习总书记调走了。”

49岁那一年,大山辞去局长,功成身退,回归文坛。这个时候,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,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。“奇迹纪事”和“古城人物”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,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,禅意浓浓,芳香四溢……

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。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,那么后期的他,则十足是佛面佛心,慈悲善目,与世无争,笑着风云,其乐融融。这其中,有一个细节让人惊讶:大山名闻遐迩,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。那些年,文学市场清凉。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,但他笑笑说,不要麻烦你们了,还是顺其自然吧。

他的书房里,悬挂着两句自题诗:小径容我静,大路任人忙。

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,但他没有忘记正定,没有忘记大山。每遇故人,都要捎来问候。每年春节,都要寄来贺卡。

但大山却鲜有回应。他知道,他的年轻的朋友,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负担。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,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。

1995年底,大山不幸患染绝症,近平十分挂念。1996年5月,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,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。春节之前,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,专门去医院看望。近平后来写道:“我坐在他的床头,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,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……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,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,我告诉他,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”

近平没有食言。仅仅十多天后,1997年2月9日,正是大年初二,他专程赶到正定。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,两人又见面了。还是那张桌子,那个茶几,那一对沙发。只是眼前的大山,枯槁羸弱,目光暗淡,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。

近平强作笑颜,佯装轻松,提议合影。大山说,我太难看,就不要照相了吧。话虽这样说,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,倚靠在被垛上,挺直身子。近平赶紧凑过去。

11天后,大山走了。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。陪同他的,是他的朋友,他的好朋友。

癸巳年末,我去正定采访。大山的家里,一切依旧,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。当年的房屋,当年的木床,当年的书桌,当年的茶几。坐在那里,凝视时空,如幻如梦,恍惚惚惚中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,隐隐约约里,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,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,依然新鲜如初,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,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,相互顾盼,心照不宣,像一对永恒的朋友……

哦,朋友,朋友,两心如月,冰清玉洁,肝胆相照,辉映你我。

(李春雷:男,1968年2月生,河北成安县人,国家一级作家,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)

(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)

忆大山

习近平

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他去世以后,在他的家乡正定,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,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昔日的同事、朋友和所有认识他、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,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,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挚交,怀着沉痛的心情,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、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。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,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记忆、广博的知识、幽默的谈吐、机敏的反应,还有那光明磊落、襟怀坦荡、真挚热情、善良正直的品格,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1982年早春,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,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。那时,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,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,但其《取经》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桂冠,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小说,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、富有哲理的辨析、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。到正定工作后,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、性格、学识、为人的议论,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敬慕之情。特别是我们与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,他那超常的记忆、广博的知识、幽默的谈吐、机敏的反应,还有那光明磊落、襟怀坦荡、真挚热情、善良正直的品格,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我到正定后,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。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,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,相互问候之后,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,文学艺术、戏曲电影、古今中外、社会人生,无所不谈、无话不谈。虽然第一次见面,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,有说不完的话题,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,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:“近平,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,但神交已久啊!以后有工夫,多来我这儿坐坐。”他边说边往外送,劝我他留步,他像没听见似的。就这样边走边说,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

此后的几年里,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,有时他邀我到家里,有时我邀他到机关,促膝交谈,常常到午夜时分。记得有好几次,我们收住话锋时,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。每遇这种情况,不是他送我,就是我送他。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,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,一人先蹲下,另一人站上肩头,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。

1982年冬,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,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局长的重担。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,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。上任伊始,他就下基层,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,几个月下来,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,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,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,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,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

作为一名作家,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。他率真善良、恩怨分明、才华横溢、理直透澈。他对一些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,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、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。因此,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,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,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。

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,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割裂开。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,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;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、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,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为强烈和独特。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,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,以诙谐幽默的语调,合情入理的分析,乐观豁达的情绪,去劝说人们,影响人们,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。同时,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,用小小说这种文学形式,尽情地歌颂真、善、美,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、恶、丑,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,增强明辨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能力,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,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。

我在正定期间,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,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,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,我们相约相聚,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,临分手时,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依依别情,难以言状。

我到南方以后,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,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,不喜热闹,未有及时回应。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,很少给他我写信了,只是偶尔在方便时,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。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,希望他在个电话的时候,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,看一看,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、工作忙,不愿给我添麻烦。虽然接触联系少了,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,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,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,我也经常向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、工作和创作状况。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,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。每年春节前夕,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,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。

1991年春节,在离开正定6年后,我受正定县委之邀,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——正定。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。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,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。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、诙谐幽默,依然那样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,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。那年,他还不到50岁,正当精力充沛、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。他告诉我,什么小说在那个杂志发表了,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,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,显得非常兴奋。那次相见,由于时间关系,我们没能长谈,便依依惜别了。

1995年深秋,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,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,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的门头上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,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:他的病情不见好转,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。后来,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,能吃进一些流食了。再后来,听说又不行了,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。刚好,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,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。见到他时,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,只见他面色憔悴,形体枯槁,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,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,还依然闪烁着流动的光亮。他看到我进来,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,紧紧握住我的双手,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。稍微平静些后,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。我坐在他的床头,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,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。那次见面,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,因为我知道,恶魔般的细胞,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、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。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,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,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,我告诉他,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

1997年2月9日,是农历的正月初三,我又一次回到正定,再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。这时的大山,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,他的面色更加憔悴,形体愈显瘦小,声音嘶哑,眼神黯淡,话语已经不很连贯,说几句就要歇一歇。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——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。至此,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,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,泪水溢满了眼眶。这时的大山,却显得非常平静,倒是先安慰起我来,他提出再和我照张合影。他笑着说:“我已瘦成这样,不像个样儿了,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!”他虽是这样说,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。这张照片,成了我和大山,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。

2月21日,在我刚离开正定十来天,突然接到电话告知——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,享年54岁。

噩耗传来,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大山的逝世,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。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,再看他最后一眼哪!无奈远隔千里,不能前往,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,以示沉痛悼念。

大山走了,他走得是那样匆忙,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,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,清正廉洁、勤政敬业的作风,襟怀坦荡、真挚善良的品格,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的精神,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,长留人间。

(原载1998年第7期《当代人》杂志)